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 建构意义世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

韩玉祥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直接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亦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文化娱乐活动为切入口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构成乡村文化振兴的一条重要路径。意义世界为文化实践提供行动的目标、理由和依据,构筑文化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建构一套完整丰富的意义世界体系,包括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和无私奉献精神五个部分。意义世界的建构逻辑包括行政激活、社会交往、社会宣传、自主组织和意义植入五重机制。行政激活为意义世界的再生产提供持久动力;社会交往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宣传实现社会声誉的再生产;自主组织赋予文化实践更多的组织机会或组织权力,从而使组织者群体或志愿者群体获得向村庄社会展示社会权力的多重机会;意义植入通过传统资源的利用与转化、仪式化行动及榜样示范三种方式建构生命延续与无私奉献的意义价值体系。由于意义世界具有改变个体人格结构、归属结构、关系结构及权力结构的多重功能,“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道德伦理建设,培育乡村人才,提升村社组织的自治能力,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意义世界;文化娱乐活动;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2)06-0012-10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脉络

21 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加快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特别在 2005 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sup>[1]</sup>。然而,以“送电影、送戏、送科普”下乡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建设效果欠佳,并未解决乡村文化凋敝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将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保障工程。这表明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发挥文化调适功能,还应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重功能。实际上,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确实有益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sup>[2]</sup>。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采取何种实践路径,将直接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亦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意义世界建构的角度,找寻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以实现乡村文化的有效振兴。

当前,关于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讨论可分为总体性研究和类型化研究两种研究思路。总体性研究思路不加区分地将乡村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尝试提出乡村文化振兴的总体性路径。龙文军等<sup>[3]</sup>提出,文化振兴的路径包括注入文化元素、推进移风易俗、教化乡村居民、保护村落遗产、开展文明评选、挖掘民间手工艺、活跃民俗节日等。这种总体性研究思路没有认识到乡村文化的内部差异性,无法针对不同类别的乡村文化采取类型化的振兴路径,难以深入探讨乡村文化振

收稿日期:2022-03-22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22ZDA101)

作者简介:韩玉祥,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兴的实践路径,只能提出方向性、综合性、宏观性的实践路径。部分学者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内部差异性,开启了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类型化研究。高晓琴<sup>[4]</sup>根据依托主体的不同,划分了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两种乡村文化,提出建构以乡、村两级为主体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韩鹏云等<sup>[5]</sup>则划分出活动载体、价值规范及精神意义三个层次的乡村文化,建议走向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治理模式。这些学者沿着类型化研究的思路,开辟“主体范式”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然而,主体范式解决了“谁振兴”的问题,却难以解决“如何振兴”的问题。因此,少数学者走向“知识范式”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毛一敬<sup>[6]</sup>将乡村文化建设区分为日常性文化和引领性文化,并分析两种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文化内容和文化供给形式等具体实践路径。陶自祥<sup>[7]</sup>将乡村文化划分为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三类,认为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坚持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的原则。

学界关于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探讨从总体性研究转向类型化研究、从主体范式转向知识范式,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沿着类型化研究的思路,知识范式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具有碎片化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学界没有抓住核心要素或变量使碎片化的知识系统化。为此,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文化实践,找出其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核心变量,才能探讨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乡村文化是一个综合性体系,不同类型的乡村文化具有不同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韩鹏云<sup>[8]</sup>遵循功能为主的乡村文化分类,按照乡村文化的生活需求属性和规范属性,将其划分为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种类型。笔者认为,按照功能为主的分类标准,可以进一步将乡村文化划分为文化娱乐活动、道德伦理及文化产业三种类型<sup>①</sup>:文化娱乐活动表现为电影下乡、送戏下乡等公共文化活动,包括公共文化场所需要的文化场地、文化设施和文化组织等,主要发挥消遣娱乐的生活功能;道德伦理指孝道伦理、乡邻互助、无私奉献等公共规则或公共规范,主要发挥社会秩序的规范功能;文化产业指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文化、农耕文明等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主要发挥文化旅游的经济功能。由于篇幅有限,本文聚焦于一种类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探讨其的实践路径。从需求紧迫性、易操作性、功能延展性、政策合法性来看,文化娱乐活动属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为此,笔者以较为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为切入口,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这构成乡村文化振兴的一条重要路径。

## 二、理论框架与案例介绍

### (一) 理论框架

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不仅生活于物质世界中,而且生活于意义世界中<sup>[9]</sup>。东西方学者都若明若暗地揭示了意义世界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意义世界为文化实践提供行动的目标、理由、依据,构筑文化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形塑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意义世界理论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或许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梳理相关文献及著作发现,意义世界理论包括内涵、构成、建构及功能四个部分:一是意义世界的内涵,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意义世界的核心问题<sup>[10]</sup>。本文的意义世界的内涵主要指关于“人为什么活着(存在)”“人应当怎样活着(存在)”的一套意义价值体系。二是意义世界的构成,是指意义世界的具体内容。其具有多样性,没有统一的形式。比如,马克思的意义世界构成是指商品拜物教<sup>[11]</sup>;梁漱溟<sup>[12]</sup>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与情义之理;许烺光<sup>[13]</sup>的是指家族绵延、传宗接代、香火

① 目前,学界关于乡村文化的分类大致有内容、主体、功能三种不同的标准。不同分类标准决定了不同的分类效果,以功能为主的乡村文化分类较为有效:第一,其将乡村文化概念实体化、具体化、情景化。进入村庄社会的实践场域后,其以乡村社会为本位进行“需求-功能”分析,契合了乡村社会的功能需要。第二,其契合实际,有利于乡村文化的靶向振兴。

延续;陈辉<sup>[14]</sup>的是指过日子。可见,意义世界的具体构成与具体的实践场域有关。三是意义世界的建构,其具有场景化特定。由于意义世界的具体构成与具体的实践场域相关,不同的意义世界构成便具有不同的建构路径。四是意义世界的功能,包括对人格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认同结构、荣辱观、劳动观、阶层结构、知识结构、规训结构、鬼神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

基于上述对意义世界理论的阐释,本文的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基于乡村文化实践的场域,笔者将意义世界的具体构成操作化为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和无私奉献精神五个方面。笔者从意义世界的理论视角出发,整体呈现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意义世界构成及其行为动力系统,并具体展现各类文化实践主体场景化、具象化的意义世界构成及其参与动力。其次,笔者系统论述上述意义世界构成的建构过程,并将意义世界的建构操作化为动力机制建构和组织机制建构。最后,以意义世界理论功能的人格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认同结构为出发点,进一步阐释建构意义世界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效果(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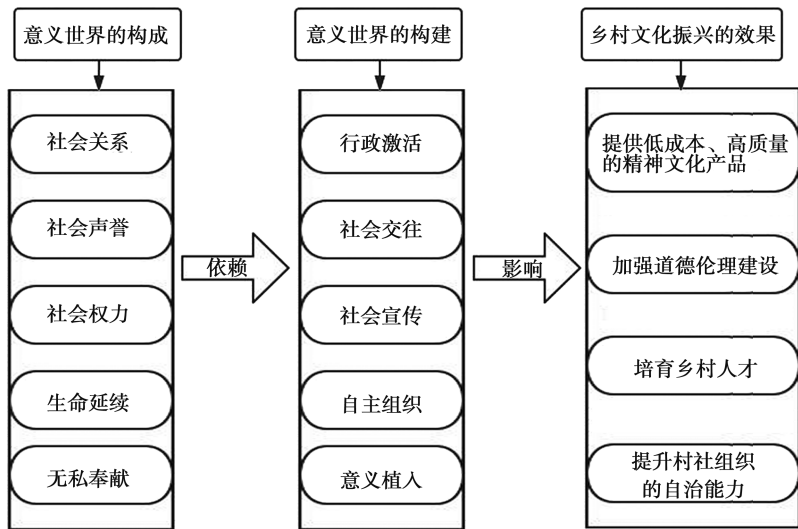


图 1 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及其效果

## (二) 案例介绍

本文选取山东省单县刘村的孝善敬老饺子宴和山西省临猗县翟村的庙会进行双案例研究。

案例一:山东省单县刘村的孝善敬老饺子宴。为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生活,弘扬养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单县县委宣传部自 2018 年 4 月 15 日起陆续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刘村的孝善敬老饺子宴始于 2019 年 2 月,基本上每月初九举办一次。孝善敬老饺子宴主要由村民组长、退休老干部等村庄精英负责组织,包括采购材料、包饺子、下饺子、桌椅安排等各项流程。中青年妇女作为志愿者不仅要协助村庄精英,还负责组织唱歌、广场舞等文艺活动。刘村最初举办孝善敬老饺子宴的费用是由政府补贴、村干部与村庄精英集资捐款共同组成的,后来逐渐形成个人自愿认领的捐款模式。孝善敬老饺子宴的活动程序采取“5+N”模式:“5”即唱红歌、上党课、讲故事、过生日、谈心愿五项活动;“N”即组织开展文艺演出、运动比赛、健康体检、理发洗脚,及为当月生日的老人蒸花馍、献寿桃、庆寿辰等活动。刘村的孝善敬老饺子宴办得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形成了自我捐款、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自主组织模式。

案例二:山西省临猗县翟村的庙会。翟村的庙会属于当地的传统习俗,每年举办两次。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是财神爷的生日,农历六月十九则是王母娘娘的生日,庙会活动必须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举行。庙会期间要唱大戏、才艺表演、大吃斋。唱大戏属于本地的风俗,必须为神灵献祭。除了唱大戏,以妇女为代表的文艺团体还义务表演唱歌、广场舞、小品等文艺节目。大吃斋也属于祭祀活动。村民先到庙里烧香拜佛,然后一起烧火做饭、一起吃斋以敬神灵。其中,唱大戏需要请剧团,大吃斋也需要食材费,为此,翟村采取自愿捐款的模式进行集资。翟村的风俗



习惯认为“本命年”群体自愿捐款可以为其带来好运,他们是捐款的主要群体,其他群体也可以自愿捐款。翟村的庙会也属于自我捐款、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自主组织模式。

### 三、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意义世界构成

意义世界与行动理由紧密关联。山东省单县、山西省临猗县等地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表明,建构意义世界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通过意义世界的整体建构,这些地方建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实现对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吸纳,赋予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行动的理由。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在文化娱乐活动中迈向意义世界,自觉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活动,使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了内驱力。与此同时,乡村文化振兴的各类实践主体是能动地、有选择地迈向这套意义世界体系,从而形塑着各类主体场景化、具象化的意义世界体系。

#### (一)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意义世界构成

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sup>[15]</sup>。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么活着?人总是找寻存在的理由,追问生命的意义。尤其在文化建设中,意义是文化的灵魂,文化的建构实质上是意义的建构<sup>[16]</sup>。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于建构一套完整丰富的意义世界体系,这构成了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这些地方实现对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吸纳。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追逐着意义,自发自觉地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使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了内驱力。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意义世界构成包括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和无私奉献精神,实现了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具体而言,在人的自然存在层面,乡村文化实践建构了生命延续的意义世界,表达人对平安、健康、财富等生存需求的美好愿望。在人的社会存在层面,乡村文化实践建构了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的意义世界,满足了人对社会地位或位置的心理需求。在人的精神存在层面,乡村文化实践建构了以无私奉献精神为代表的意义世界,解决了人的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间的内在张力,满足了人对超越性精神的心理需求。在此意义世界体系中,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实现了对意义世界的完整丰富的体验,获取了社会文化行动的理由,激发出乡村文化振兴的无限热情与动力。接下来,笔者将具体展现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求取何种生命意义,从而呈现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场景化、具象化的意义世界构成。

#### (二) 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如上所述,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实现了对意义世界的完整丰富的体验,从而具有持续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然而,乡村文化振兴的各类实践主体是能动地、有选择地迈向这套意义世界体系,从而形塑着各类主体的场景化、具象化的意义世界体系。具体而言,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包括受益者、捐赠者、组织者、志愿者四类群体。这四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世界构成略有差异(表1),即参与动力略有差异。

表1  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地点	文娱活动类型	文娱活动项目	受益者的意义世界	捐赠者的意义世界	组织者的意义世界	志愿者的意义世界
山东省单县	凡俗类	孝善敬老饺子宴	社会关系	社会声誉	社会权力、无私奉献	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声誉、无私奉献
山西省临猗县	神圣类	庙会	社会关系、生命延续	社会声誉、生命延续	社会权力、生命延续	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声誉、生命延续

##### 1. 受益者群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受益者是乡村文化娱乐活动的享用者。由于人、财、物的外流,乡村文化娱乐活动的受益者

群体主要为留守老人或留守妇女两类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群体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主要享用者。受益者群体在文化娱乐活动中求取社会关系与生命延续两种意义体系。社会关系是个体意义建构的基础。对多数个体而言,社会关系是首要的意义来源<sup>[17]</sup>,尤其是亲密关系使个体感受到归属与爱。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长期处于精神空虚的状态,有很强的社会交往需求。通过社会交往,人与人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成为受益者群体意义世界构成的一部分。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可以让老年人定期见面,大家在一起聊聊天,热闹一下。生命延续是个体的基础性追求。出于对财富、健康、平安等基本生物需求的渴求,个体建构着生命延续的美好愿望。尤其是留守妇女群体,相对于男性群体而言,其家庭角色扮演是消极无为的,倾向于通过求神拜佛、烧香点火等行为求取家庭的财运与平安<sup>[18]</sup>。因此,留守妇女群体具有较强的生命延续的心灵需求。庙会活动不仅是社会交往活动,更是一种祈福活动,祈求着家庭的财运与安康。

## 2. 捐赠者群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捐赠者是指在乡村文化娱乐活动中捐献财或物的群体。捐赠者群体涉及村庄社会的所有群体,捐赠数额较大者一般为村庄社会中的富人及热心人士。捐赠者群体在文化娱乐活动中有求取社会声誉和生命延续的两种意义体系。社会声誉是社会性地位的象征。拥有良好社会声誉的人可以获得大家的尊重与认可。单县、临猗县的文化娱乐活动都依赖于社会集资。这些捐赠者被村庄社会评价为条件好、人品好的群体,享有社会美誉。为此,村庄社会内部会展开社会声誉的意义争夺。单县的经验最为典型。每月一次的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经费约1000元,县里鼓励年轻人出资以表孝心。结果,许多老年人纷纷以子女的名义捐款,为子女和家庭争取良好的社会评价,以致出现排队捐款的现象。生命延续也是捐赠者意义世界构成的一部分。临猗县的经验表明,其捐款方式不仅关涉社会声誉,也关涉生命延续的美好愿望。庙会活动的捐款者包括两部分群体:一部分为富人及热心人士,另一部分则为“本命年”群体。48岁、36岁、24岁的“本命年”群体自愿捐款,象征着吉利与平安。显然,庙会活动在捐款者中嵌入祈福话语,从而实现对捐款者群体的意义建构。

## 3. 组织者群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组织者是指在乡村文化娱乐活动中负责人员安排、后勤保障、规章设计等各项事务的群体。组织者群体一般为地方社会精英,包括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教师、医生、退伍军人、技术人员、热心人士等乡贤群体。组织者群体在文化娱乐活动中求取社会权力、无私奉献精神和生命延续三种意义体系。社会权力是社会地位的核心象征,直接彰显个体的社会性存在。通过掌握社会权力,组织者群体获得组织大众及志愿者群体的权力。在组织者与被组织者的频繁互动中,组织者也逐渐积攒着社会威望。在此背景下,组织者具有“控制社会”的意义体验,感受着个体的社会尊严。无私奉献是人对超越性意义的追求。当人不再局限于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自然会追问何种生命是真善美的生命,迈向精神层面的意义世界。组织者群体大多属于地方社会的精英群体,其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社会声誉良好,因而倾向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体验。各地的经验表明,组织者群体具有无私奉献的公共精神。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的组织者杨某告知我们:“每到饺子宴活动,不用别人通知,我们这些组织者会自动去帮忙安排各类事务。我们好多人是村民组长、街长、党员,应该为大家服务。”生命延续亦是组织者群体意义世界构成的重要部分。庙会活动表明,组织者群体不仅是对大众无私奉献,更是对神灵的无私奉献。正如上帝的信徒通过教会活动谋取神职及奉献他人,最终目的是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些组织者在庙会活动中实现了为神、为己、为他的统一,为神灵、自我与他者无私奉献,求取着生命延续的福报。

## 4. 志愿者群体的意义世界构成

志愿者是指在乡村文化娱乐活动中参加文艺演出、义务劳动的群体,一般为村庄社会中有爱心的中年群体,尤其是中年妇女群体中的热心人士。志愿者群体的意义世界构成则更为丰

富,其在文化娱乐活动中求取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声誉、无私奉献精神和生命延续五种意义体系。第一,对社会关系的追逐。留守妇女群体具有很强的社会交往需求。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中年妇女融入集体,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建构自我的亲密关系,感受着归属与爱。正如庙会活动的文艺表演者所言,“即使没有报酬,大家也都是自愿的。我们主要图热闹,融入集体”。第二,对社会权力的追逐。这里主要指社会性别权力。在传统男权统治的秩序之下,女性不具有完整的社会权力。文化娱乐活动给予女性性别展演的社会平台。在此过程中,女性通过能力的自我确证逐渐走向自我肯定,建构自我认同。女性不再囿于家庭,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庸,而是拥有同男性一样的社会能力与社会权力,真正成为独立的非依附性的女性。第三,对社会声誉的追逐。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中年妇女展现着个人的才艺能力与高尚品格,获得村庄社会的称赞与认可。对社会声誉的追逐是这些中年妇女意义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对无私奉献精神的追逐。志愿者群体为村庄社会中的热心人士,大多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单县的文化娱乐活动转变为孝道伦理的实践场域,使其从家庭场域扩展到村庄社会场域,家庭的义务话语便转变为村庄社会的奉献话语。志愿者群体不是为老人尽义务,而是为老人无私奉献。第五,对生命延续的追逐。如上所述,女性的家庭角色扮演是消极无为的,倾向于通过彼岸世界为家庭求取财运与平安。这些文艺表演、宴席、烧香点火等都是对神灵的祭祀仪式。正是通过这些仪式活动,志愿者群体通过虔诚的付出,向神灵传递自己的心意,从而祈求神灵的福报反馈。

#### 四、意义世界的建构逻辑

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不可能具有超越性的人性能力,自发建构出丰富完整的意义世界体系。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生命意义的生产逻辑更加走向了个体主义和享乐主义,人们注重当下的、即时的、快节奏的、流变的生命意义建构。实际上,不管是传统时期还是现代,个体生命价值的选择与意义赋予,往往需要基于所在社群的组织、文化形态、信息的传播方式、交通状况等条件之上<sup>[19]</sup>。意义世界的建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各地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表明,意义世界的系统性建构包括动力机制和组织机制两个维度。意义世界建构的动力机制为行政激活,组织机制则包括社会交往、社会宣传、自主组织和意义植入。这两个维度的意义世界建构共同形塑出具有稳定性、持久性、丰富性的意义世界体系。

##### (一) 行政激活:意义世界建构的动力机制

随着村落社会共同体的逐渐解体,村庄内部丧失了意义再生产的稳定动力。很多地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及意义建构特别依赖于卡里斯玛特质的组织者群体。遗憾的是,卡里斯玛特质的组织者属于极少数群体。这就决定了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及意义世界的建构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行政力量成为意义世界建构的动力来源。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人民政党的职责,行政体系具有意义世界建构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行政力量属于制度化力量,行政动力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

调研发现,单县、临猗县等地通过行政激活的方式在县域范围内开展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层层压实行政责任,为乡村文化活动的有效组织及意义世界的再生产提供了持久动力。具体而言,行政激活体现在行政考核、行政督导、行政奖励三个方面;其一,行政考核。这些地区将文化娱乐活动列为县级党委部门的常规工作,纳入县对乡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县级党委部门通过日常检查“倒逼”各个乡镇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在综合排名中靠后的乡镇表现则会影响乡镇干部的人事晋升及绩效工资。同时,乡镇通过台账及活动记录的检查考核村级组织,进而影响村级组织的综合排名及村干部的绩效工资。其二,行政督导。一方面,县级党委部门下派工作组驻村,形成对乡、村两级的现场督导。另一方面,县级党委领导通过日常的调度会督导工作,对



工作落后的乡镇给予领导压力。与此同时,乡镇政府则通过调度会和联村干部包村督办的方式督促村级组织完成工作任务。其三,行政奖励。为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尤其在文化娱乐活动的启动阶段,县级党委部门对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的村级组织给予一定经费补贴。

## (二) 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建构的组织机制

社会关系是在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串门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方式,形塑着村庄社会内部的人情与关系<sup>[20]</sup>。随着市场化对乡村社会的席卷,乡村社会关系发生解体与重构<sup>[21]</sup>,人与人之间的串门逐渐减少。乡村社会越来越需要制度化的社会交往方式。常态化的文化娱乐活动正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制度化方式。

不同于图书下乡、送戏下乡、电影下乡等文化娱乐活动,单县、临猗县等地的文化娱乐活动具有较强的社会交往属性。以单县孝善敬老饺子宴、临猗县大吃斋为代表的活动最为典型。虽然这些餐饮活动中穿插着跳舞、唱戏等各类活动,但其更多是辅助于社会交往的调味剂。在餐饮活动中,洗菜、和面、擀皮儿、调馅、包饺子、生火、做饭、吃饭、洗碗等一系列活动都在社会交往中完成。组织者群体、志愿者群体、受益者群体之间产生频繁密集的社会互动,形塑出社会交往的空间场域。在此空间场域中,人与人之间建构着自我的社会关系网络,亲密关系得以维持和强化,一般关系实现建构与扩张。

## (三) 社会宣传:社会声誉建构的组织机制

“声名远播”这一成语表明声名与传播之间的关系。社会宣传是社会声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传统村落社会的封闭环境中,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强有力地形塑着中国人特殊的面子观与声誉观。然而,村庄社会结构的开放使社会舆论宣传的声誉建构能力弱化。新时期需要社会宣传方式的多重组合才更有利于社会声誉的再生产。

调研发现,社会宣传方式包括通知公告、广播宣传、舆论宣传、媒体报道等。通知公告是传统的宣传手段,村级组织通过张榜公示及公开告知的方式宣传好人好事。比如,在单县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中,村书记到各个餐桌上告知大家本次捐款者的姓名。广播宣传是指通过乡村大喇叭宣传好人好事。舆论宣传是指社区团体内部的口口相传。社会交往的空间场域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人们在密集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传播着各类信息,形成对好人好事及坏人坏事的舆论评价。媒体报道则指新闻媒体的介入。单县在孝善敬老饺子宴活动中邀请大众日报、齐鲁晚报、菏泽日报等地方党政媒体进行宣传。这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让各类文化实践主体有了更广阔的社会展示平台,从而使社会声誉具有更强的意义吸纳能力。

## (四) 自主组织:社会权力建构的组织机制

以图书下乡、送戏下乡、电影下乡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行政主导的模式。行政主导模式部分削弱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权力,从而使乡村文化建设常常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sup>[22]</sup>曾以公共池塘资源为例,提出公共服务供给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道路。自主组织模式通过组织机会或组织权力的赋予,充分激发村庄社会的积极性,实现村庄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在文化娱乐活动的组织过程中,组织者群体或志愿者群体获得向村庄社会展示社会权力的多重机会,组织机会或组织权力便转化为社会权力。组织者群体或志愿者群体通过掌握社会权力,占据有利的社会位置,拥有了社会身份。

调研发现,文化娱乐活动的自主组织主要体现在自主管理和自主服务两个方面:其一,组织者群体自主管理文化娱乐活动的各类问题。文化娱乐活动中,以村干部、村民组长、老党员、热心群众为代表的组织者群体面临着资金来源、活动内容设计、规章制度设计、人员组织安排等各类问题,其通过召开集体会议协商解决。以资金来源为例,单县孝善敬老饺子宴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企业赞助、乡贤捐款、村民认领、政府部分资助等。以活动内容设计为例,临猗县的庙会活动包括大吃斋、文艺表演、烧香拜佛等活动。以规章制度设计为例,组织者群体协商讨论

文化娱乐活动的村规民约。其二,志愿者群体自主服务受益者群体。不同于送戏下乡的市场化外包服务,志愿者群体可以自主参与到活动过程中,具有社会性展示的机会。比如,在餐饮活动中,志愿者群体负责洗菜、和面、擀皮儿、调馅、包饺子、生火、做饭、洗碗等一系列活动;在文艺表演活动中,志愿者群体负责自编自导自演。

### (五) 意义植入:生命延续建构与无私奉献建构的组织机制

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不可能具有超越性的人性能力,自发建构出丰富完整的意义世界体系。意义世界作为一种意识体系需要意义灌输与意义植入的过程。调研发现,生命延续与无私奉献的意义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意义植入的方式包括传统资源的利用与转化、仪式化行动、榜样示范。其一,传统资源的利用与转化是指传统资源的挖掘更具有亲和性和认同性,从而使人易于接受。单县的孝善敬老饺子宴借助传统孝道伦理资源,把孝道伦理的实践场域从家庭转向村落社会。临猗县的庙会活动则借助风俗信仰建构了生命延续的意义世界。其二,仪式化行动通过社会仪式的展演不断强化着生命延续与无私奉献的社会共识。社会认同的意义世界体系便成为个体潜意识里认同的意义世界体系。其三,榜样示范通过感化的方式形塑意义场域,将每个人卷入意义世界。组织者群体的无私奉献行为或虔诚信仰行动感染着每一个人,大家也逐渐接受和认同了无私奉献或生命延续的意义价值体系。

## 五、“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

文化治理理论认为文化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张面孔<sup>[23]</sup>。在此理论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应当发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多重功能,实现其与乡村振兴的多重耦合。意义世界具有改变个体人格结构、归属结构、关系结构及权力结构的多重功能,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具体而言,“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可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道德伦理建设,培育乡村人才,提升村社组织的自治能力。

### (一) 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

“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为人民群众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一方面,由于意义世界改变个体的人格结构,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追逐意义世界体系,具有乡村文化实践的内生动力,使乡村文化振兴走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集资的自治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实践的经济成本和组织成本很低,并且可以形成长效化机制。另一方面,意义世界体系包括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和无私奉献精神,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还能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

### (二) 加强道德伦理建设

“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加强了道德伦理建设。道德伦理建设的关键在于社会共同体的培育。而意义世界的建构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村落之间的意义关联,使村庄社会成为意义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意义世界改变着个体的人格结构与精神结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混乱的道德失序现象得以抑制,大写的人正在崛起。个体迈向了意义世界,找回了魂灵。道德伦理建设的加强典型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建构意义世界有利于培育文明、和谐、爱国、友善四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完整的意义世界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促进社会主义文明。意义世界体系中无私奉献精神勾连着孝道伦理,有利于建构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意义世界形塑着人的归属结构,人们逐渐形成对村庄社会的集体认同和对基层组织政治认同,从而衍生出爱国主义精神。意义世界改变关系结构,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从而走向友善与互助。



### (三) 培育乡村人才

乡村人才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的再生产。意义世界改变个体的人格结构、归属结构、关系结构和权力结构,培育一批有公心、有能力的精英群体。一方面,个体形塑无私奉献的人格特质,具有了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人与村落之间的意义关联使村落社会真正成为个体的精神家园,个体建立起对村落社会的归属与认同。于是,个体具有建设美好家园的无限热情与动力。与此同时,关系结构的改变丰富了村庄社会的关系网络,权力结构的改变增加了组织者群体与志愿者群体的社会权威。通过社会关系资源和社会权威资源的掌握,组织者群体和志愿者群体说得起话、办得起事,具有了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能力。这样,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的组织者群体和志愿者群体成为村庄社会中有公心、有能力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群体积极参与文化娱乐活动、人居环境整治、日常纠纷调解、社会价值引领等各类事务,活跃在村庄社会舞台上。

### (四) 提升村社组织的自治能力

“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有利于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从而强化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有助于促成集体行动。社区社会资本包括关系性资本、结构性资本、认知性资本:关系性资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结构性资本是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资本是指社区归属感、志愿主义等<sup>[24]</sup>。意义世界改变个体的人格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及归属结构:人格结构的改变形塑着志愿主义或公共精神;关系结构的改变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建构村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权力结构的改变建构村庄社会权威,转换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性位置;归属结构的改变则增强了人对村落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显然,意义世界的建构增加了三个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从而实现村民自治。

## 六、结语

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有益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采取何种实践路径直接影响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亦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意义世界为文化实践提供行动的目标、理由、依据,改变文化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形塑特定的文化模式。因此,意义世界理论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或许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调研发现,各类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追逐意义价值体系,这构成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参与动力,建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这都表明,意义世界的建构对于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研究确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例,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从意义世界理论出发研究乡村文化振兴实践。

实践表明,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于建构一套完整丰富的意义世界体系,这构成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行为动力系统。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场域中,意义世界的构成包括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和无私奉献精神五个部分,实现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实现对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意义吸纳,赋予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行动的理由。由此,各类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在文化娱乐活动中迈向意义世界,使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了内驱力。意义世界的建构包括动力机制和组织机制两个维度。意义世界建构的动力机制为行政激活,组织机制则包括社会交往、社会宣传、自主组织和意义植入。意义世界具有改变个体人格结构、归属结构、关系结构及权力结构的多重功能,这正是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机制。“建构意义世界”路径下的乡村文化振兴能够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道德伦理建设,培育乡村人才,提升村社组织的

自治能力,有利于乡村全面振兴。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尝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其一,乡村文化振兴应当重视意义世界的建构,构筑生命延续、社会关系、社会声誉、社会权力及无私奉献精神等多重意义价值体系。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更加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或文化资源的开发,相对忽视文化实践与生活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二,为了实现意义世界的再生产,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设计需要确立社会交往、社会宣传、自主组织及意义植入等建构意义世界的方向性原则。与此同时,政策设计应当在确立方向性原则的基础上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自主空间,使乡村文化实践走向行政引领下的自主治理。其三,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建立健全行政倒逼机制,强化政策执行力。上级政府需要通过行政考核、行政督导、行政奖励等方式压实各级主体责任,激活各级主体的文化治理动力。

参考文献:

[1] 吴理财,解胜利.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9,20(5):100-111.

[2] 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

[3] 龙文军,张莹,王佳星.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解释与路径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9,40(12):15-20.

[4] 高晓琴.乡村文化的双重逻辑与振兴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87-96.

[5] 韩鹏云,张钟杰.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局及破解之道[J].长白学刊,2017(4):142-150.

[6] 毛一敬.农村文化建设实践路径的类型化分析——基于对农民文化需求实践的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0(3):119-130.

[7] 陶自祥.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4):54-62.

[8] 韩鹏云.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振兴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4):1-9.

[9] 秦光涛.意义世界[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11-13.

[10] 杨华.隐藏的世界:湘南水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11] 张有奎.物、意义与虚无: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1):36-41.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86.

[13] 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王芃,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出版社,2001:65.

[14]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家庭经济模式——基于关中Z村调查[J].西北人口,2012,33(4):101-104.

[15]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5.

[16] 徐贵权.论意义世界[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1-16.

[17] 刘亚楠,张迅,朱澄铨,等.生命意义研究:积极心理学的视角[J].中国特殊教育,2020(11):70-75.

[18] 韩玉祥.民间宗教的分类治理策略——基于鄂东南L村田野调查[J].科学与无神论,2020(4):42-46.

[19] 成庆.“内卷化”与意义世界的重建——兼与徐英瑾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21(7):90-98.

[20] 刘飞,任冠彪.“你来我往”——论农村串门所体现的村落价值[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25(2):121-122.

[21] 石伟,董国礼.集市村庄:基层市场与村庄的互嵌逻辑与发生机制[J].青海民族研究,2021,32(4):134-140.

[2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13.

[23] 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1):58-68.

[24] 罗家德,方震平.社区社会资本的衡量——一个引入社会网观点的衡量方法[J].江苏社会科学,2014(1):114-124.

(责任编辑:李凌)  
(英文摘要下转第101页)

## How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stance

ZHANG Chen, ZHANG Zhengyan, MA Bi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in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s in 2019,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e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the place where they move in. Physic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the degree of prejudice al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There is a certain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ethods and resettlement loca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distance has a greater hindering effe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scattered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and urban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Therefore, to improve social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by holding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lind date activities, etc., and eliminat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between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reate a fair and just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to eliminate the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of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fter the reloc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o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due to disputes over interest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Dist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上接第 21 页)

## 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Meaning: An Important Path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HAN Yuxiang

**Abstract:** The choice of th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One of important path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developed by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with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s a key point. The meaning world provides the goal, reason and basis of action for cultural practice, and constructs the behavior dynamic system of cultural practice. The key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and rich world system of meaning, including life extension, social relations, social reputation, social power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meaning world includes five mechanisms: administrative ac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social propaganda,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and meaning implantation. Administrative activation provides lasting power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eaning world; social communication constructs th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between people; social propaganda realize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putatio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give cultural practice more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ies or organizational power, so that the organizer groups or volunteer groups can have multiple opportunities to show their social power to the village society; meaning implantation constructs the meaning value system of life continuation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through the u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ritualized actions and example. The meaning world has multiple functions-changing individu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meaning world” under th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low cost and high quality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and nurturing rural talents, and promotes rural organizations autonomy abilit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 world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eaning World;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ural Revitalization